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29-230

全球中文版 2006年9月

国际博物馆

museum

INTERNATIONAL



非洲：
充满成就的大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中文版发刊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松浦晃一郎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以来,加强不同文化的对话一直是该组织的核心工作之一。实现这个愿望的办法很多,有时很困难,经常很复杂。然而,有一个办法更能有利于相互间的理解:这就是多种语言之间的知识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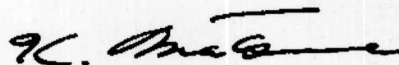
在我有幸向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团体介绍首次出版的《国际博物馆》杂志中文版的同时,也给了我机会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的文化机构对语言的多样化及知识的传播做出了具体的支持。

在文化遗产方面,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强调亚洲文化在丰富我们对遗产的理解和更新防护与保存方法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了。

2003年,我们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它标志着国际范围内文化遗产保护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对这无可估价的财富的肯定。从此以后,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支持国家的遗产评估与国际网络进行交流;同样,也应该更加广泛地收集地区与传统的知识,以便把它们纳入国际合作的模式之中。这将有助于未来全球范围内保护实践的多样化。

上述这些内容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物馆》杂志中文版的重心,每一期除了原刊文章外,还包括由中国专家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撰写的内容丰富的文章。

译林出版社是中国享有盛名的专业出版社,与它合作将更有效地拓宽国际空间,强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本杂志的专业性。在这里,我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义,向有助于对世界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重获新认识的所有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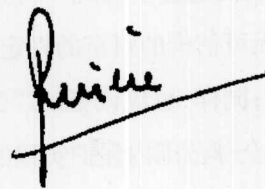


中文版首期寄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副总干事、出版总监 弗朗索瓦兹·利维埃尔

《国际博物馆》杂志中文版第一期介绍了非洲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现状,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计划。事实上,对于一个国际性的定期刊物而言,有什么比把一个大陆的经验和认识带到另一个大陆,共同分享过去的成果、面对未来的挑战更加理所当然的呢?

《国际博物馆》杂志作为国际范围内有关遗产和博物馆文化政策的传播媒介,其使命就是建立一个对话的平台,向所有致力于保护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团体开放。这一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这一杂志的 efforts 的具体表现,其目的是扩大合作空间,强化国际性。期待已久的中文版将有利于这本杂志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继续对科学实践的多边合作进行研究与传播。我们热切地期待在将来的某一期向我们的读者全面介绍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博物馆。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国际博物馆 第 229-230 期

全球中文版 2006 年 9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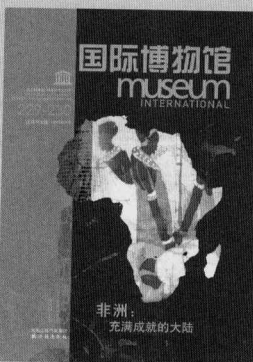
| 非洲：充满成就的大陆

封面：

“所绘、所写、所画的*。”

塞内加尔传统巴蒂克印花的一个细部。

*“巴蒂克”(印花法)的字面释义。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列)

冯骥才 许嘉璐

吕章申 阮仪三

郑欣淼 单霁翔

章新胜 龚良

出版人 顾爱彬

主编 刘锋

责任编辑 李瑞华

© UNESCO 2006

Co-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7 place de Fontenoy, 75007 Paris, France

And

© Yilin Press, China 2006

ISBN 7-5447-0171-9/K·1

The choice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facts contained in this publication and the opinions expressed therein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UNESCO and do not commit the Organization. The designations employed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throughout this publication do not imply the expression of any opinion whatsoever on the part of UNESCO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ny country, territory, city or area or of its authorities, or the delimitation of its frontiers or boundaries.

本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译林出版社合作出版。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和翻印。

4 | 编者的话

9 | 非洲：充满成就的大陆

建造开普敦第六区博物馆

西拉杰·拉苏尔 | 9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组织：成就与挑战

爱德尔·法拉 | 18

措迪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

菲利浦·塞加迪卡 | 28

非洲的文化立法与博物馆

文森特·内格里 | 38

44 | 非洲的复杂性

古迹和传统技术：以廷巴克图的清真寺为例

阿里·奥德·西迪 | 44

作为一项跨国事业的古尔·瓦姆库鲁

马珀帕·姆通伽 | 52

口头语言和文化认同：乍得图普里的口头传统

伊丽莎·菲奥里奥 | 61

说故事作为在博物馆中传播知识的途径：以斯嘎那一谋透一谋透为例

阿格汉·欧德罗·埃根 | 68

74 | 未来的任务：回忆与发展

“非洲 2009”：授权非洲

加丽亚·萨莫瓦—弗雷罗 | 74

摩洛哥博物馆面面观

萨基娜·拉里比 | 85

“作为艺术品的杰内”的起源与结构：

世界遗产领域内的利益与风险

罗贝尔托·克里斯蒂安·加蒂 | 91

蒙巴萨耶稣堡博物馆：城乡环境中博物馆的社会网络经历

姆瓦迪默·瓦兹瓦 | 9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濒危可移动文化财产

和博物馆发展计划 | 105

106 | 数字遗产新闻

参与性数字文化内容

凯蒂·格布 | 106

109 | 中国的声音

工业遗产保护现状的分析与思考：

关注新型文化遗产保护

单霁翔 | 109

迈向永续发展的历史街区：

以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为例

阮仪三 | 120



| AFRICA: A CONTINENT OF ACHIEVEMENTS

4 | EDITORIAL

9 | A CONTINENT OF ACHIEVEMENTS

Making the District Six Museum in Cape Town

Ciraj Rassool | 9

The National Museums of Kenya: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Idle Farah | 18

Managing Intangible Heritage at Tsodilo

Phillip Segadika | 28

Cultural Laws and Museums in Africa

Vincent Négri | 38

44 | AFRICAN COMPLEXITIES

Monuments and Traditional Know-how: the Example of
Mosques in Timbuktu

Ali Ould Sidi | 44

Gule Wamkulu as a Multi-state Enterprise

Mapopa Mtonga | 52

Oral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Oral Tradition in Tupuri (Chad)

Elisa Fiorio | 61

Storytelling as a Means of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in
Museums: the Example of Sigana Moto Moto

Aghan Odero Agan | 68

74 | THE TASKS AHEAD: MEMORY AND DEVELOPMENT

Africa 2009: a Story of African Empowerment

Galia Saouma-Forero | 74

Taking Stock of Moroccan Museums

Sakina Rharib | 85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Djenné as a Work of Art':
Stakes and Risks in the Realm of World Heritage

Roberto Christian Gatti | 91

The Fort Jesus Museum in Mombassa: its Experience

Regarding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s

Mwadime Wazwa | 99

UNESCO Programm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Endangered Movable Cultural Properties and Museum
Development | 105

106 | DIGITAL HERITAGE NEWS

Participatory Digital Cultural Content

Kati Geber | 106

109 | VOICE FROM CHINA

Analysis of and Reflections on Industri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 New Field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Shan Jixiang | 109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Neighbourhood:
the Conservative Planning of Pingjiang District in Su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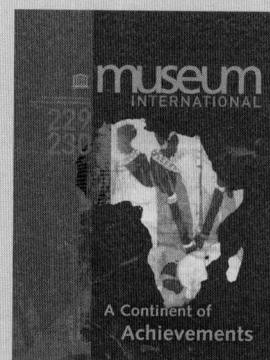
Ruan Yisan | 120

COVER:

"What is drawn, is written, is
painted*." A detail from a
traditional batik from Senegal.

*Literal translation of "Batik".

© Marina Taurus



DIRECTOR OF THE PUBLICATION:

Mounir Bouchenaki

EDITOR-IN-CHIEF:

Isabelle Vinson

EDITORIAL ASSISTANT:

Atieh Asgharzadeh

Sandra Acao

ENGLISH TRANSLATION:

Renée Champion

Barbara Shapiro-Comte

ADVISORY BOARD:

Amarendra Galla, AUSTRALIA

Nicholas Stanley-Price, Director-

General, *ex officio*, ICCROM

Yani Herreman, MEXICO

Nancy Hushion, CANADA

Jean-Pierre Mohen, FRANCE

Stelios Papadopoulos, GREECE

John Zvereff, Secretary General

of ICOM, *ex officio*

Michaël Petzet, President, ICOMOS,

ex officio

Tomislav Sola, REPUBLIC OF CROATIA

DESIGN AND LAYOUT:

Taurus Design, 93800 Épinay

© UNESCO 2006

Published for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sation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Auth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choice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facts contained in signed
articles and for the opinions expressed therein,
which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UNESCO
and do not commit the Organisation. The
designations employed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in Museum International do not imply
the expression of any opinion whatsoever
on the part of UNESCO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ny country, territory, city or area or of
its authorities, or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its frontiers or boundaries.

失窃



©扎伊尔国家博物馆组织

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扎伊尔)沙巴地区出土的镀黑铜木质汉巴人雕像,高27.1厘米。

1990年7月或8月在扎伊尔国家博物馆组织被盗。藏品编号为73.320.1。

(国际刑警组织登记编号:1990/36122)

编者的话

最近几十年来,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遗产保护方法的更新,非洲大陆无疑是这一更新的重要行动者。《国际博物馆》的这一期合刊专门报道了非洲的成功与挑战,它是由两位特邀编辑洛娜·阿邦古(Lorna Abungu)和乔治·阿邦古(Georges Abungu)完成的。两位都通过专业网络积极地介入到国家、地区和国际项目中。洛娜·阿邦古是一位专业考古学家,自2000年起任非洲博物馆国际理事会执行干事。乔治·阿邦古也是考古学家,1999—2002年任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组织总干事,现在是遗产规划和国际管理顾问。

伊莎贝尔·万松(Isabelle Vinson)

这一期《国际博物馆》所讨论的范围与广度,事实上表明非洲是一个拥有多样性和巨大文化遗产财富的大陆。从口头历史和法律框架,到博物馆的重建,它表明自从博物馆的概念(以及今日所实行的遗产管理)被引入到非洲以来,这个大陆已经经历了重要的变化。

非洲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使以博物馆的形式继承下来的机构与它们的藏品相一致,而且在于使这些机构内部从殖民地过去继承下来的需要与抱负相一致。在应对这些挑战时,非洲大陆上的各个国家不得不努力克服西方的博物馆概念。西方人把博物馆看作是一个收藏、保存、教育和展览的场所,往往更加重视它们所拥有的藏品,而不是它们理应为之服务的社群。

长期以来,非洲大陆上的许多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机构都不得不面对国家/政府不够重视的状况,因为我们的政府要解决教育和健康之类的基本服务,还要应付改善基础设施的要求。但是博物馆也必须应对各种问题:管理遗产的能力,在拥有遗产的社群中创造自觉意识,非物质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同等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处理博物馆中的腐败和盗窃问题,也就是萨基娜·拉里比所说的摩洛哥的“文化失血”。

博物馆作为一个有争议的空间在非洲要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明显。非洲博物馆发

展的历史,其殖民地背景,在独立之后继续管理博物馆的殖民精英们最终“放手不管”的经历,缺乏对本地人的能力培养,以及故步自封拒绝改变——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各种各样的争议。本期杂志通过不同的文章,不仅成功地说明了博物馆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面临的种种挑战,而且说明了各种各样常常是积极的转变;这些转变使得非洲的博物馆处在了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话语的中心,并且使它们走上了得到承认的道路。

阅读本期的文章,无疑可以感受到非洲的博物馆已经认识到遗产,特别是文化遗产,在塑造当代社会生活上的力量。被视为中立和非政治领地的博物馆如今性质发生变化,打破了它们先前僵化的本性,变成了广泛对话的空间。对此的最好例证是西拉杰·拉苏尔的文章:《建造开普敦第六区博物馆》。通过运用一群人和一个地方的历史,特别是被迫搬迁的经历,回忆和一种文化表达变成了团结和恢复的源泉。通过借助回忆来聚集和重建第六区的社团整体性,诞生了一座叫做“第六区”的博物馆,它成了社群权利和利益的捍卫者,为归还土地和回归最初生活空间的权利而斗争。这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这种区别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非常适当的——把博物馆置于人类对话的中心,让它成为一个愈合和原谅的场所。这也极大地提升了社群博物馆的形象。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组织的例子是把国家遗产转变为人类的重要资源。它表明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机构,不仅可以在保护遗产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可以焕发活力,使公众获得娱乐和教育,并且为公众所用。它进一步驳斥了这样的观点,即博物馆(尤其在非洲)是僵化的、非主动的,充其量是遗产破坏与偷盗的场所。肯尼亚的情况是动态的、主动的博物馆机构的例子,它接纳变化,能够吸引大量的资助用于一个重建过程。它是一个成功的、可供效仿的例子。尽管这篇文章只是突出了一座博物馆,但应该注意到,非洲其他的重要博物馆也经历了类似的重建过程(虽然规模没有这么大),例如巴马科的马里国家博物馆和赞比亚的利文斯顿博物馆。

非洲大陆的博物馆开始接纳制度性的重建和发展,在考虑可持续性问题时,仍然忠诚于它们的使命。它们的使命如今常常被扩大,已超出了藏品的管理和展览,而致力于积极的、创造性的公众参与。

本期的第二章证明了口头文化和传统知识的力量,它们往往是共享的,并且流传后世。非洲的传统知识常常遭到诋毁,多半不会被视为遗产的一部分。由于认识到它们构成了非洲存在的一部分,并且是对非洲认同和遗产保护至关重要的信息来源,这些传统知识如今拥有了新的生命。

从阿里·奥德·西迪讨论有关建造技术和材料的口头知识以及保护和恢复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到马珀帕·姆通伽以古尔·瓦姆库鲁作为培养群体认同和保护传统的社会控制工具的实例,到伊丽莎·菲奥里奥对口头文化和文化传统的研究(其中语言是作为汇编信息的工具,口头词语成为社会的世界图景的再现),再到欧德罗·埃根把创造性的说故事作为传播知识和促进理解的途径——这一章对口头传统作了有力的说明,并陈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物质遗产中的作用。进而言之,像博物馆之类的遗产机构在宣传和利用遗产中的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

口头历史是一条能增强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纽带,充当着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接,同时也是世代之间的连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的召开,现在有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而非洲以其多样性和丰富性,应该成为领路者。

关于回忆和发展,很显然,非洲不仅在认识其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方面,而且在认识到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来管理其遗产方面,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非洲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大陆,面临着许多挑战,但也是领跑者。看看加丽亚·萨莫瓦—弗雷罗的文章,了解“非洲2009”计划,我们就不能不同意她的说法,“‘非洲2009’表明非洲人对非洲文化遗产的保护巩固了他们的认同感,强调了其丰富多样性,并且开启了新的发展道路”。

非洲迄今为止在遗产管理领域所开展的培训集中于并且旨在解决现存问题和制定未来规划。通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的“非洲博物馆保护”(PREMA)课程——它促成了非洲博物馆发展计划(PMDA,现今的非洲遗产发展中心/CHDA)和非洲遗产学院(EPA)——而开展的工作,以及非洲博物馆国际理事会

(AFRICOM)、西非博物馆计划(WAMP)和非洲—瑞典博物馆计划(Samp)所做的努力,都象征着非洲承担起了保护其遗产的义务。甚至非洲博物馆国际理事会的实习计划也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尽管它所采用的并非传统的培训方法。

毫无疑问,从一个充满问题、缺少成就的大陆,到一个全面关注保护和利用其最珍贵的资源即遗产的大陆,非洲经历了漫漫长途。

这一期特别合刊表明非洲及其合作伙伴的积极投入,以及通向各种各样成功的漫长道路。这并不是说非洲不再有问题。相反,我们需要继续构筑人类能力,形成和改进法律框架,把社群包括进遗产管理的所有事务之中,利用传统知识体系和其他有助于可持续性的非物质遗产,与世界其他地区一起共同保卫人类遗产。贯穿本期各篇文章的共同线索很清晰:非洲是一个贡献者,而不是一个接受者。

洛娜·阿邦古和乔治·阿邦古



©TARA/David Coulson 见 www.africanrockart.org

1. 非洲岩画。肯尼亚境内东非大裂谷北段图尔卡纳湖附近刻画在散落岩石上的几何图案。

建造开普敦第六区博物馆¹

西拉杰·拉苏尔

西拉杰·拉苏尔是西开普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也指导该大学的非洲博物馆和遗产研究项目。他是第六区博物馆的托管会成员,非洲博物馆国际理事会科学委员会主席。他在博物馆研究、遗产、视觉历史和阻抗史学方面著述广泛。

1994年12月,第六区博物馆在开普敦第六区边上的中央卫理宣教会教堂对外开放,这一年南非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该博物馆作为一个项目而创立,旨在研究第六区历史和被迫搬迁经历,并把记忆和文化表达作为团结与恢复的源泉。它的建立是第六区博物馆基金会五年多筹划的结果。第六区博物馆基金会是1989年不干涉第六区委员会(HODS)建立起来的机构,该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开普敦中心地区附近的平民政治中。当时大企业和该市提出倡议,要按照中产阶级、“多种族”的思路来发展第六区,委员会发起了一场反对运动,表达了“改革”伴随着国家压迫机器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²

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出现了一系列非政府组织和文化项目,以保存第六区的记忆,该基金会即是其中之一。第六区位于桌山脚下开普敦市中心区域,曾经有60000人被迫从市中心迁出。1992年,该基金会在中央卫理宣教会教堂举行了为期两周的摄影展。从前的居民聚集在教堂里,大量的照片、放大的幻灯图像以及老电影镜头把他们带回到这个区的过去,引发了他们对往事的无限感叹。正是这种通过记忆重新聚合和恢复第六区的有形完整性的愿望,使得第六区博物馆在两年之后成立。

第六区博物馆基金会的文化工作也支持第六区的主张土地权制度,这是根据《土地权利归还法》确立的。³这种由从前第六区居民有组织的机构(其中

包括第六区公民协会)领导的对土地权的主张,倡导重建第六区,要求那些在1950年由于种族隔离政府的《群体区域法》而被驱逐出去的人回来。1966年,第六区被宣布为“白人”区。此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搬迁,破坏了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除了清真寺和一些教堂,它的建筑物和有形景观也都被夷为平地。在主张土地权过程中,博物馆不断在问此类问题,即主要关注住房和城市整体发展的恢复和再开发过程,怎样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历史和纪念的问题上来。第六区博物馆的出现也被理解为同“真理与和解委员会”的建立有关,部分原因是由于“挖掘”过去和记录痛苦而难忘经历这些共同特点。⁴这种联系当然反映了对于博物馆创建的一种道德和神学视角,以及博物馆的空间被作为愈合和原谅场所的一些方式。⁵

以社群为基础的博物馆

跟开普敦的卢万多、萨默赛特西、克罗斯罗德和普罗蒂亚村,东伦敦的东班克,以及伊丽莎白港的南区那些以社群为基础的博物馆项目一样,第六区博物馆大部分位于边缘地带,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遗产体系之外,因而位于全国性艺术、文化和遗产的官方资金流之外。尽管这一点导致了看得见的制度脆弱性,以及对变化无常的捐赠资金的依赖,但是这类新兴博物馆由于被排除在国家遗产体系和国家遗产优先项目之外,也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平台感,而且产生了一种非预期的后果,即提高了建构一种充满生机的、独立的、竞争性的公众文化的可能性。

在南非,“社群博物馆”的范畴也许最强烈地与第六区博物馆的文化工作关联在一起。那些随着第

六区博物馆而开始在南非不同地方出现的地方性博物馆,以第六区博物馆为先例,也开始自称为“社群博物馆”。有必要评估一下“社群博物馆”的范畴,理解其作为南非内外日益发展的博物馆领域新生的文化范畴所带来的讨论和争论,思考其形形色色的知识谱系和政治谱系。这也要求我们重新回到“社群”范畴,它努力争取和主张的认同与确认,以及在文化所有权要求和项目中被利用的方式。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调查研究,这样的话,随着新的地方性博物馆的成立和第六区博物馆的特点被重复,这个范畴就不只是一个用于指称一种博物馆类型的技术术语。

从第六区博物馆作为开普敦市立博物馆成立以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立的介入场所,一个审视诘问后种族隔离的当前状况以及根置于其生产和再生产之中的制度、关系和话语的空间。它也作为一个研究、再现和教学的混合空间而运作,通过这一空间,知识与形形色色的思想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地方、制度和社会领域之间被中介和协调。⁶

1994年,第六区博物馆开放时的展览名为“大街:重溯第六区”。这是用第六区的景观遗留物和材料创造出来的,利用了文件、照片、纪念品和手工艺品。展品中有一幅第六区的大型地图,铺满了大部分展厅。从前的第六区街道名牌是从铲平第六区的拆迁队的头儿那里收集到的,他把这些标牌保存在自家的地下室里了。这些标牌在博物馆里展览出来,摆成柱状,挂在地图的上方,成为这个区有形的实体符号。从前居民的大幅画像印制在透明设计纸上,成排地挂在廊台上,凝视着下面地图上的参观者。在地图旁边的手工绘画的凹室里,摆放着从前居民捐赠的影集和收藏的照片,通过视觉资料明证了第六区的



2. 第六区博物馆研讨班:学生们坐在绘有地图的地板上进行小组交流。

社会生活和文化表达。在地图边上,透明的展示箱中有第六区的土和石头,以及居民生活用具的出土碎片:瓶子、陶器碎块、刀具和孩子们的玩具。⁷

通过“大街:重溯第六区”的视觉再现、复原的手工艺品和详细的文献资料,再造了第六区的空间,使得博物馆成了“回忆考古学”,试图以想象的方式来重建第六区的物质结构和社会风景。老的自由教堂被设置在“连续的空间舞台”中,是经历、意义和阐释的一个地层学,它会开启愈合第六区“被破坏的社群”的可能性。⁸ 自由教堂曾经是奴隶的后代做礼拜

的地方,后来成为政治行动者的避难所。因此,毫不奇怪,博物馆建成不久,许多参观者就把它当作了“第六区”,当作第六区的回忆和纪念地点,因此它不得不尽力满足让它变得更真实的愿望。

在博物馆里,一个专供回忆的艺术舞台提供了一个地方,“让社群的人走到一起,分享他们的经历和回忆”。⁹ 这些行为和过程都极为短暂。通过动人的声音,博物馆的凹室成为“至今未进述的辛酸故事的证人”,地图和织物上的题词也为博物馆的展馆特点赋予戏剧性意义。博物馆成了一个“互动的公共空



3. 图3、图4和图5摄于20世纪初,在第六区的人们搬迁之前。博物馆档案。

间”,在这儿,“人们对第六区的反应”提供了它的“戏剧和结构”。¹⁰在这座博物馆里,通告、交谈和讨论是其创造性、管理过程和回忆政治的一部分。

这个博物馆里充满了辩论和讨论,它们关系到这个区的文化表达、社会历史和政治生活,关系到地方史和国家的过去,以及如何最好地把这些内容在博物馆的工作中体现出来。博物馆的成员开始讨论处理开普敦社会工程的更广泛历史以及南非其他地方“被迫搬迁”经历的方法。人们承认,第六区的象征性地位已经掩盖了开普敦其他地方以及南非各地的搬迁经历。但是,第六区主张土地权的过程为博物

馆创造了机会,使其介入到关于开普敦的未来以及该市的公民和社会复兴过程的讨论之中。第六区博物馆作为论坛的最强有力表达出现在它举办官方的土地权归还听证会的时候。1997年,为了解决在把所有的土地权要求纳入到一个完整的开发计划之中的不成熟尝试上存在的分歧,土地权法庭在博物馆举行了一次专门会议,批准当地政府承认个人土地权的决定。第二年,在博物馆挤满了人的大楼里,中央政府、市政府和受益人信托公司签署了一个谅解录,目的是促进涉及到许多利益人的困难的土地归还过程。



作为混合空间的博物馆

有时候,这些讨论和介入关涉到博物馆的性质,还有“博物馆”概念本身的文化政治。这正是第六区博物馆基金会用来定义其历史和回忆项目的范畴。需要把第六区博物馆理解为一个混合空间,它把学术、研究、收藏和博物馆美学与社群的管理和责任的形式以及主张土地权政治结合了起来。它把许多人的能量和见解集中到一起:与社群有关联的学者和从前的居民。这些学者中有些人视自己为“行动主义的知识分子”,但他们通常带有学院的限制性标志,前居民中有许多人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行动主义的知

识分子,深深植根于以第六区为基础的政治和文化组织之中。第六区博物馆的组织结构和项目计划是要居中协调知识类型和文化表达的交流和交换,并把这些互动编织进其工作节奏当中。这样一种混合成员的协同和争论一直位居第六区博物馆的管理方法和反应教学法的核心。

2000年,在修葺一新的自由教堂里举行了“挖掘得更深”展览。这次展览标志着对待博物馆展览和公共文化的更为复杂的态度。“挖掘得更深”是一次自觉的反省展览,力求表达博物馆内部的焦躁,希望能够更加细致入微、更为复杂地讲述第六区的故事。



© Cloete Breytenbach Collection

“大街：重溯第六区”主要聚焦于在公众中构建的空间和生活，而“挖掘得更深”则努力探求人们生活的私人和内在空间。在设计“挖掘得更深”展览时，博物馆探究其收藏的物品和过程，提出有关这个区更为复杂的问题。翻修一新的博物馆门口的纪念文字反映了提出难题的愿望：“我们力求运用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成就和我们的羞辱，我们荣耀的时刻，我们的勇气和爱，还有我们相互带来的伤害。”¹¹

博物馆的托管会成员、艺术家佩吉·德尔波特用美学的语言谈到“挖掘得更深”的“物质性、透明性、灵活性和层次性”，还谈到其材料表面“柔和硬的特

殊性”抵消了摄影和数字创造的因素。制作成墙纸和绘画的放大摄影图像呈现了逼真的再创造，而从口头历史研究中得来的历史画板、年表、一系列地图和生活—历史文本，展现了第六区复杂的文化、知识和政治发展。手工制作的嵌花和绣花旗帜反映了第六区公共领域中的诸多制度：宗教、政治、教育和文化。博物馆不同地方的穹顶传出来的声音则回应着叙述者的声音，“博物馆的主要内容和生活资源”。第六区博物馆的一个展室——“诺姆维尤室”——内部根据生活—历史研究进行布置，传达出一种多功能房间的生活环境感，这是许多穷人的生存基础。¹² 博物馆里的地图、织物、街道标牌和放大的画像如今更多地关注保护和空间问题，它们一直是展览的核心内容。

通过艺术家、研究人员、志愿者、刺绣组织的参与和第六区前居民的不断捐献，出于自觉的研究和展览计划，第六区博物馆得到重新塑造，形成了一个展览的视觉和空间框架。这个展览“由经验证据和表达因素编织成的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构成”。作为批评和质疑的直接后果，第六区博物馆通过一种更为发人深省的、逐渐削弱的传统，大胆而谨慎地重新创造了它“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空间”，保证它不会成为“一个等着被消费的物品，只是让人瞧瞧，留在那儿无人理睬”。这个空间将被“参观者不断改变、分层和颠覆”。¹³ 在采取这一方法时，第六区博物馆反复重申，这既不是一个天真单纯的空间，也不是一种简单化的真实性。其完整性和长期可持续性取决于保护其表达和批评的独立空间，取决于通过不间断的对话、阐释和争论构建其对象和社群的连续过程。

由于博物馆的资源被运用来支持归还土地的过